

屈家岭文化的北渐

孟原召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 北京市 100006)

关键词: 屈家岭文化; 北渐; 文化交流

摘要: 屈家岭文化早期向北扩展, 占据了豫西南地区, 晚期更是影响渗透到豫南、豫中、陕东南等地, 甚至波及晋南地区。在这种北渐过程中, 体现出明显的渐进性和地域性特征, 这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Key words: Qujialing Culture; Northward extension; Cultural exchange

Abstract: The Qujialing Culture has influenced northward and occupied the southwest of Henan since the early period. Further more, in the late period, it has infiltrated the south of Henan, the central Henan, the southeast of Shanxi and other areas, and even spread to the southern region of Shanxi. In this process from the South to North, it reflects obviously the progressive and significan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also the result of several factors.

屈家岭文化是1954年在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调查时发现的^[1], 它是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分布于长江中游的一种史前文化, 它与其后继的石家河文化构成了长江中游环洞庭湖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主体文化^[2]。屈家岭文化多圈足器和凹底器, 以薄胎晕彩陶杯、厚胎喇叭形杯、壶形器、双腹器(鼎、碗、豆盘等)、彩陶纺轮等为特色^[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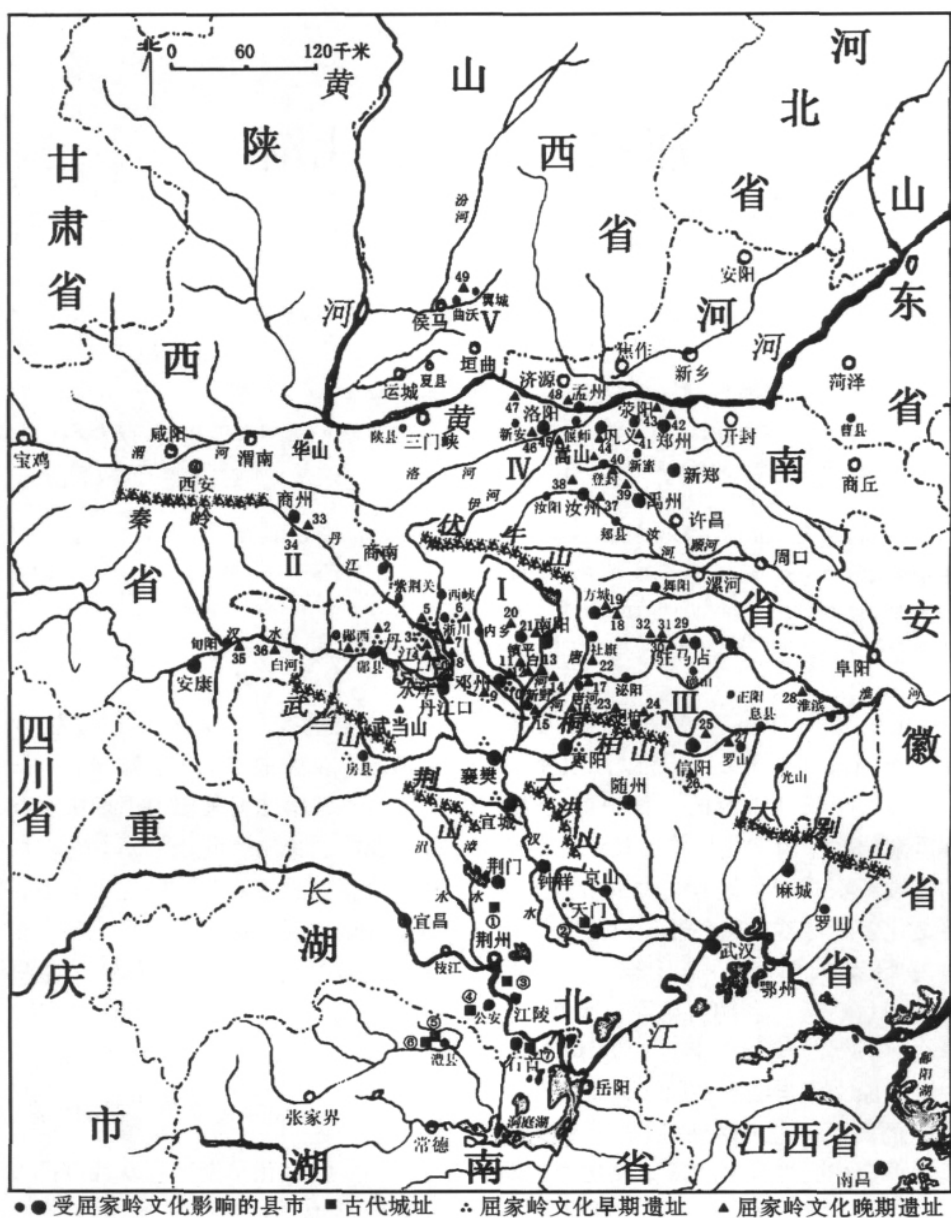
早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 如大溪文化, 黄河中游中原文化与江汉平原文化就已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4], 特别是到了仰韶文化时期, 这种交往变得频繁起来, 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 特别是两大区域的交界地带。随着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史前文化的调查和发掘, 发现了较为丰富的屈家岭文化遗存, 并在湖北郧县青龙泉、大寺、河南淅川下集和邓州八里岗遗址, 均发现了“仰韶-屈家岭-龙山”三叠层的文化堆积关系, 初步搞清了屈家岭文化在豫西南地区的分布情况^[5], 并认为该地屈家岭文化当属“青龙泉类型”^[6], 或称为“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二期类型”^[7], 以示区别属于石家河文化的

青龙泉三期类型^[8]。在信阳、驻马店等豫南地区以及豫中的禹州、郑州、洛阳和陕西的商县、晋南曲村等史前遗址中也存在着或强或弱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图一) 由于这种影响存在着相对明显的先后关系, 因而可对其分期说明。这里采用张绪球先生的屈家岭文化分期方法^[9], 分为早、晚两期, 下面就以此为线索探讨屈家岭文化的北渐情况^[10]。

一、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北渐

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在北部的发现主要是豫西南地区, 包括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这里将鄂北、鄂西北也归入此区), 北部可达伏牛山、唐白河上游地区, 西北至丹江上游, 东北扩散到桐柏山、淮河上游一线。据目前资料看, 湖北郧县、河南淅川、邓州一带的分布较为密集, 内涵也较为丰富。

豫西南地区是屈家岭文化向北越过湖北而最先到达的地区, 同时也是河南境内屈家岭文化分布最为密集、堆积最为丰富的地区; 稍西南的鄂西北地区因位置相邻、文化



图一 屈家岭文化北渐示意图

I 鄂北豫西南地区 II 陕西南部 III 豫南地区 IV 豫中地区 V 晋南地区

①荆门马家垸 ②天门石家河 ③江陵阴湘城 ④公安鸡鸣城 ⑤澧县城头山

⑥澧县鸡叫城 ⑦石首走马岭

1. 大寺 2. 青龙泉 3. 黄棟树 4. 雷嘴 5. 下王岗 6. 下集 7. 双河镇 8. 埠口 9. 黑龙庙
10. 八里岗 11. 凤凰山 12. 邓禹台 13. 光武台 14. 翟官坟 15. 西高营 16. 影坑 17. 寨茨岗
18. 金汤寨 19. 大张庄 20. 赵湾 21. 黄山 22. 茅草寺 23. 陡坡嘴 24. 闵岗 25. 阳山
26. 三里店 27. 李上湾 28. 沙塚 29. 党楼 30. 杨庄 31. 荆树坟 32. 三所楼 33. 庾原
34. 紫荆 35. 红号 36. 张家庄 37. 中山寨 38. 煤山 39. 谷水河 40. 杨村 41. 楚湾
42. 大河村 43. 西山 44. 里沟 45. 南砦 46. 王湾 47. 西沃 48. 许村 49. 天马一曲村

面貌相似亦可列为此范围。该地区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与龙山文化层之间,早晚期遗存均较为单纯,但早期遗存尚不甚丰富,并且越往北早期遗存就越少,可见此时屈家岭文化尚未对该地区及更北地区产生较深影响。下面以青龙泉、大寺、下集、黄楝树、下王岗和八里岗等遗址为例(图二),说明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北进情况。

青龙泉和大寺遗址^[11],均位于湖北郢县,其“仰韶—屈家岭—石家河—龙山”叠压关系明显,屈家岭文化堆积相对较少,可分为早、晚两期,属早期的遗存更少。根据发掘报告及发表材料,青龙泉遗址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的文化堆积和单位有第Ⅰ区第9层,第Ⅱ区东部第7、8层和西部第10~16层,及房址F6、灰坑H11、H12和大量红烧土层,在整个遗址范围内,屈家岭早期遗存分布范围远比仰韶文化要小,堆积也不是很厚。大寺遗址遗存中较为明确的有H9,屈家岭文化对该地影响较小、晚。

下王岗遗址^[12],位于河南淅川县(上集)西南35千米的下王岗村东红石冈上,东、北、南三面临丹江,堆积包含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西周几个时期,其中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的遗迹有H113、H153等,出有双腹碗、圈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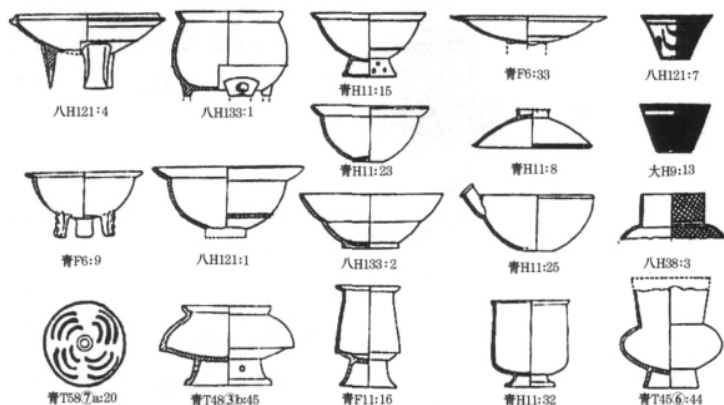
杯、壶形器、钵、罐等。该地地处豫西南地区,与湖北交界,地势较低,因而屈家岭文化在早期阶段已对该地有所影响。

黄楝树遗址位于河南省淅川县西南黄楝树村西的斜坡台地上^[13],遗存以屈家岭文化为主,有少量仰韶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堆积,其中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已遍布该遗址,典型单位有H28、F15,出土有较多的敞口折沿平底凿状足盆形鼎、深腹豆、圈足杯、彩陶壶形器、澄滤器等器物,可看出屈家岭文化对该地的影响已经相当深入。

下集遗址^[14],位于河南省淅川县老贯河东岸的倾斜台地上,该遗址屈家岭文化层夹在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中间,其中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的遗迹有H9、H11、H13、H24等,包括鼎、罐、双腹豆、彩陶壶形器等。

八里岗遗址^[15],位于河南省邓州市城东八里的湍河南岸河旁台地上,遗址为坡状高冈,面积约为60000平方米。1991年秋至2010年秋,先后进行了十余次较大规模的发掘。遗址文化层因取土破坏严重,屈家岭文化遗存主要为开口于耕土层或第2层下的灰坑,其中属于早期的有H38、H43、H133、H150等,器类包括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类,有鼎、双腹碗、壶形器、圈足杯、彩陶纺轮等。

屈家岭文化对北方黄河流域文化的影响在其早期阶段较弱,影响范围也较小,集中在豫西南地区,并且也只是零星分布,其主体文化还是原来的仰韶文化遗存,但是已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渗透,越晚更为明显,甚至有的地区已经上升到主体地位,周围地区也有少量屈家岭文化遗物。



图二 屈家岭文化早期器物(鄂北、豫西南地区)

八: 八里岗 青: 青龙泉 大: 大寺

二、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北渐

到了屈家岭文化晚期阶段,对黄河中游地区的影响是相当强大的,豫南、豫中、豫西北、晋南等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不少遗址中都掺入了屈家岭文化因素。这一时期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北渐大体可分为五个区域,即豫西南、豫南、豫中、晋南、陕东南地区。下面即根据屈家岭文化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区域和程度的不同依次分析。

1. 豫西南地区

主要包括唐白河流域、丹江下游地区。这是屈家岭文化分布最为密集、遗物最为丰富的地区。其分布地域涵盖了屈家岭文化早期分布区,并向四周扩展,在很多地方都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址,而早期就有的遗址到了此期堆积更为丰富。屈家岭文化层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上,而其上则是石家河文化遗存或河南龙山文化遗存,内涵单纯,屈家岭文化应是该地区该时期的主导文化。(图三)

青龙泉遗址里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的遗迹较多,有房址 F1、F2、F3,石器制作场地,烧土遗迹(T52 ~ T55、T57 ~ T60、

T62 ~ T64 第3层),陶窑 Y1、Y2,灰坑 H11、H13、H14,以及墓葬 M41、M44、M45 和 W34 ~ W39 等,可见此时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屈家岭文化聚落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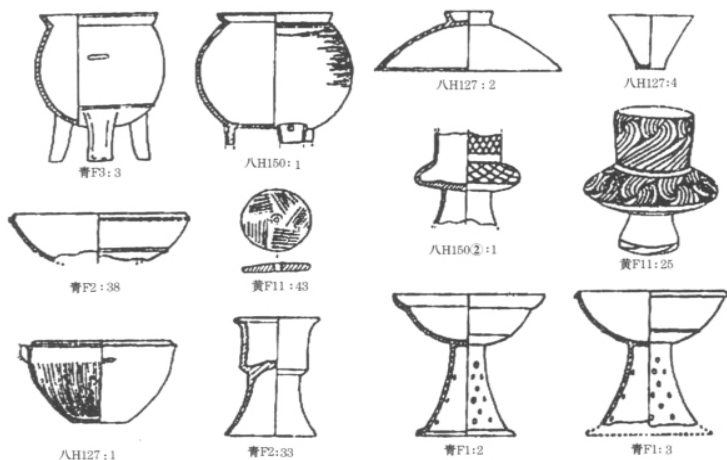
下王岗遗址中,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也已明显分布,亦属屈家岭文化势力范围。包括 H275、H156 等 10 多个灰坑遗迹,此外,报告中的第 4 层亦属于此类遗存,遗物包含具屈家岭文化风格的各种器类,如鼎、罐、双腹豆、圈足杯和喇叭形杯、器盖以及彩陶纺轮等。此遗址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遗存更为丰富。

八里岗遗址中的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揭露的相当丰富,有 HG2、H127、H121、H158、H126、H772、H649、H776、H583 等,屈家岭文化的诸器形在此遗址中均有发现。

大寺遗址中的 H25、H7、M5,黄楸树遗址中的 F11,下集遗址中的 H25、H17 等均有具屈家岭文化风格的器物出土,并且在同期遗存中的比重也最大。

唐河寨茨岗遗址^[16]出土的陶鼎 H2:8、器盖 T2:98 和圈足杯、喇叭形杯以及彩陶纺轮 T1:4、T2:9 等与湖北屈家岭遗址和石家河遗址基本相同,此外,罐、钵的陶质陶色和纹饰与屈家岭遗址也是相似的,因而,该遗址属于屈家岭文化系统,从分期来看,为屈家岭文化晚期。

此外,在新野的凤凰山、西高营、翟官坟、邓禹台、光武台遗址,唐河的影坑、茅草寺(今属社旗,1958)^[17]遗址,镇平赵湾(1958)^[18]遗址,淅川双河镇(1964)、埠口、雷嘴(1966)、马岭(1975)遗址,南阳黄山(1958)遗



图三 屈家岭文化晚期器物之一(豫西南地区)

青:青龙泉 八:八里岗 黄:黄楸树

址,邓州黑龙庙遗址,方城金汤寨、大张庄^[19]遗址中都存在着屈家岭文化晚期因素^[20]。

豫西南地区的文化面貌较多地表现为屈家岭文化晚期特征,成为该地区在这一时期的主导文化,是屈家岭文化北渐过程中首先到达的地区,也是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而当地原有文化基本上被取代,反映了屈家岭文化北渐的猛烈势头。

2. 豫南地区

主要包括河南南部的淮河上游地区。经考古调查和发掘,在信阳、罗山、驻马店、泌阳、淮滨、桐柏、息县、光山、正阳、确山^[21]一带均有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遗存发现。(图四)

李上湾遗址^[22]所见的折腹盆形鼎、矮圈足罐,以及时代稍晚的喇叭形杯、彩陶圈足杯与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遗存相近,其文化面貌较多地呈现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特征,即便它地处南北文化交流地带,而此期对该地影响最大的仍属屈家岭晚期文化。

三所楼和荆树坟遗址的出土遗物中^[23],我们可以看到厚胎喇叭形杯、高圈足豆、高柄小壶、陶塑小动物等具有屈家岭文化风格,但是该地遗址则较多具有了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遗风,体现了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

期遗存的双重性特点。

党楼遗址^[24],其一期遗存包括第4、5、6三个文化层,灰陶为主,大部分为素面和磨光陶,所出的圈足小罐、圈足杯、壶形器和双腹豆与青龙泉屈家岭文化晚期同类器非常相似,该类遗存也是兼纳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和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两种风格。

而位于豫南地区东部的淮滨县沙塚遗址^[25],更多地表现了大汶口文化特征,但双腹钵形鼎、高柄壶形罐、圈足壶形器等器物则可看出屈家岭文化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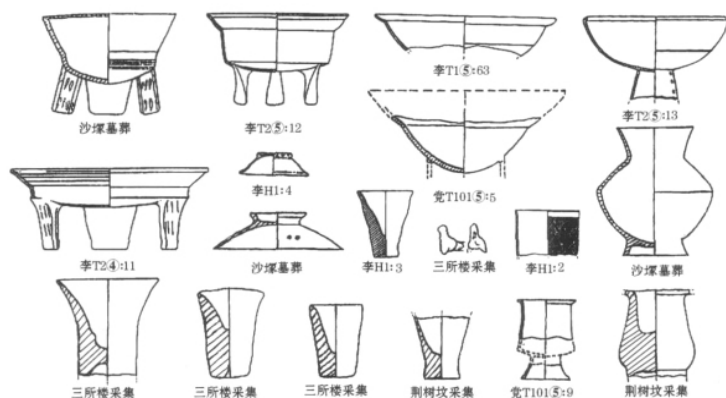
此外,信阳三里店^[26]、阳山遗址^[27],桐柏陡坡嘴、闵岗遗址^[28],驻马店杨庄遗址第一期遗存^[29]等均体现了两地文化的交流。

豫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反映出的屈家岭文化面貌比之豫西南地区较弱一些,这跟其地理位置有较大关系,该地和江汉平原之间有桐柏山、大别山等天然屏障阻隔,其文化北渐受到阻碍,该地的屈家岭文化因素来源与豫西南地区有较大关系。

3. 陕西东南部地区

主要指陕西东南部的丹江上游地区。具代表性的遗址是陕西东南商县城东南约7千米处的紫荆遗址^[30]。这是一处文化堆积较

厚、文化类型复杂的古文化遗址,包含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晚各个时期的遗存,而夹在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紫荆第五期文化之间的紫荆第四期文化遗存则包含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屈家岭晚期文化和客省庄二期类型几种文化因素^[31],其中圈足杯、薄胎敞口杯、彩陶纺轮、器盖、小杯、盆等器物与郧县青龙泉及淅川下王岗十分接近,受该区影响较



图四 屈家岭文化晚期器物之二(豫南地区)

李: 李上湾 党: 党楼 荆树坟、三所楼、沙塚报告中未作编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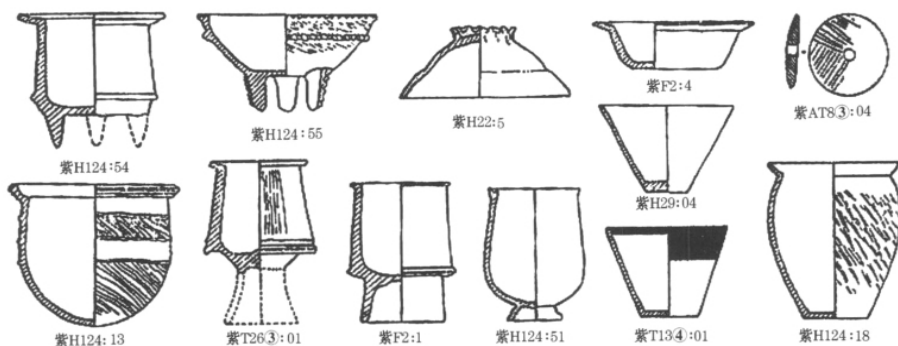
大。商州市庾原遗址^[32]中 H16 采集到的 1 件夹砂灰陶直壁杯也具有明显的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特征。此外,陕西南部安康地区的红号遗址和张家庄遗址^[33]采集到的标本包含有较多江汉平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的特征,出土的球形釜、直口罐等遗物反映出一定的屈家岭文化的渗透。(图五)

4. 豫中地区

包括河南中西部的禹州至郑州、洛阳一带,地处汝河、颍河流域和伊、洛河流域,直到黄河沿岸地区。此区为仰韶文化的中心分布区,但在仰韶文化晚期,该区文化面貌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它较多地溶入了南方江汉平原地区的文化因素,是中原文化系统与长江流域文化系统相互影响碰撞与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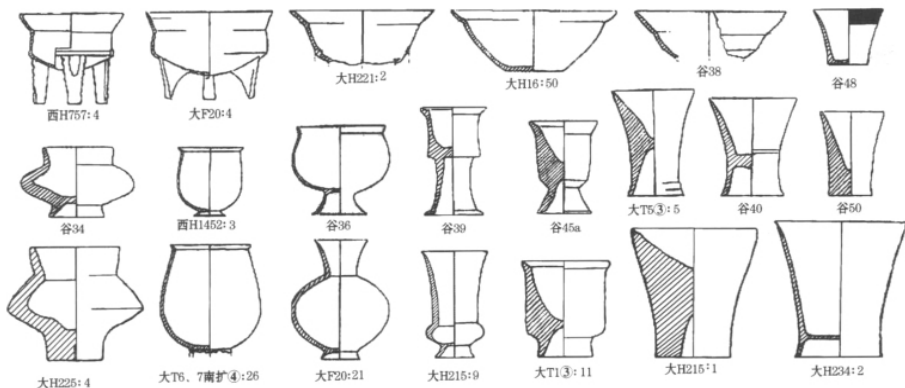
的结果。该类遗存在禹州、郑州、洛阳、登封、临汝、荥阳、巩义、新安、孟县等地均有发现。(图六)

禹州谷水河遗址^[34],位于禹州顺店东南 2 千米处谷水河村西北,地处颍河与谷水河汇合的隆起台地上。经过 1959 年 4 月和 1975 年冬两次调查和之后的小规模试掘,其史前遗存大致可分为具有继承关系的前后三期,这三期遗存比较复杂,大体上讲属于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体系,但在其二、三期遗存中也渗透了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部分特征,所采集和发掘的双腹豆盘、圈足杯、厚胎喇叭形杯、彩陶薄胎敞口杯、壶形器、折腹鼎、盆、器盖和网格纹黑彩泥质红陶器等与屈家岭晚期文化面貌相似。这



图五 屈家岭文化晚期器物之三 (陕西东南部)

紫:紫荆



图六 屈家岭文化晚期器物之四 (豫中地区)

西:西山 大:大河村 谷:谷水河

三期遗存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是部分地吸收了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诸多因素而呈现出较复杂面貌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

郑州大河村遗址^[35],位于郑州市东北郊柳林大河村西南1千米的漫坡土冈上,北距黄河7.5千米,遗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该遗址反映的文化类型被称为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体现了豫中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大河村遗址地居中原腹地,四周文化对它的影响也会使之呈现诸多文化因素,包括来自西部的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影响,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冲击,以及已经到达豫西南地区的长江流域屈家岭文化的渗透,使得大河村遗址文化面貌显得丰富多彩。屈家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阶段,即报告中的三、四、五期遗存,其延续时间比较长,可见一种发展的文化理应是一种开放式的文化。典型器物有F20中的壶形器、鼎,属于第三、四期的圈足杯、厚胎喇叭形杯、折腹盆以及1983、1987年发掘的双腹鼎、壶形器和厚胎杯、彩陶碗等。其中F20则较为全面地体现了屈家岭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因素在该遗址中的共存情况。郑州西山遗址^[36]第五、六组陶器也出有类似的遗物,当属同一类型。

荥阳楚湾遗址^[37]出土的鼎、折腹盆、彩陶纺轮,伊河下游偃师南砦遗址^[38]发现的双腹豆盘、折腹鼎,巩义里沟遗址^[39]出土的双腹豆盘、厚胎杯,登封杨村遗址^[40]发现的喇叭形厚胎杯都具有屈家岭文化风格。临汝煤山遗址^[41]出土的鼎、杯以及红陶鸟与信阳地区泌阳三所楼遗址相似,刻槽盆与淅川下王岗遗址屈家岭文化的澄滤器十分相近,体现了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对汝、颍河流域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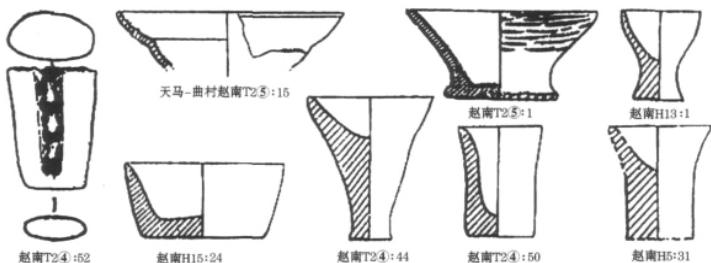
响。新安县西沃遗址^[42]出土的厚胎杯以及洛阳王湾遗址^[43]出土的鼎、双腹盆、双腹盘式细高把镂空豆、折腹短粗把豆也具有江汉平原风格,是豫中地区仰韶文化的扩展。汝州中山寨遗址^[44]第四、五期遗存和黄河北岸的孟县许村遗址^[45]第一期文化遗存中也发现有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鼎和杯。

豫中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因素已不再是豫西南地区的占领或居主导地位,而是中原仰韶文化在周边文化的冲击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各地文化,从而独具一格,是一个综合型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影响较弱,但从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屈家岭文化强烈北进的势头和中原文化受到的冲击,也说明了屈家岭文化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中原仰韶文化分布区的中心地带。

5. 晋南地区

主要发现在天马一曲村的赵南遗址^[46],出土有双腹豆盘和厚胎杯,这与豫中地区屈家岭文化风格的器物十分相近,由此可知屈家岭文化的影响可达该地区,应该是受到豫中文化的直接影响,但这种影响已显得十分微弱,该地仍以原有的晋南关中文化为主。(图七)

至此,屈家岭文化的北渐过程已基本完成,可以看到屈家岭文化的向北扩张在早期还不甚明显,到了晚期甚至更晚的石家河文化偏早阶段其势力达到鼎盛。屈家岭文化,这一源于江汉平原的史前文化,在其形成后不久便向北发展、扩散,与黄河流域仰韶文



图七 屈家岭文化晚期器物之五(晋南地区)

均出自天马一曲村赵南

化碰撞的同时,占据或影响了豫西南、豫南、豫中以至晋南等地,从而将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北界拓展至黄河中游地区。

三、屈家岭文化北渐的特点

根据前文对屈家岭文化北渐的分析,它既表现了文化扩散的渐进性特征,同时又体现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的融合即地域性特点,下面简要说明这两个方面。

其一,渐进性。即由文化中心区逐渐向北扩展,最终形成屈家岭文化的北部格局。

屈家岭文化在江汉平原一带形成并发展起来以后,便逐步向四周扩张,从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等屈家岭文化的中心区向北到达鄂北地区,进而到达鄂西北,越过湖北到达豫西南地区,并且较少地表现为融合,而呈现为取代的趋势。如果一种文化不发生强烈碰撞是很难发生取代作用的,因而屈家岭文化取代当地仰韶文化则应伴有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而后,屈家岭文化的影响则是以豫西南为据点,逐渐向东、西、北三面施加压力,而使豫南、豫中等地呈现出较多的屈家岭文化风格,但其影响已远不及它对豫西南地区的占领。这种文化的渐进式移动在其典型器物的形态变化和数量增减的对比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可从前面各地区的器物形态和发展变化图中看出。

由此可知,屈家岭文化的北渐过程很明显地带有强弱不同的渐进性,这个过程是屈家岭文化势力扩张、北进的过程,体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强盛,同时也是屈家岭文化因素由多到少、由强渐弱的过程;相反地,当地原有文化因素也就愈往北愈明显。

其二,地域性。即屈家岭文化分布区域内的文化面貌很明显地带有地方性特征,多是属于混合型文化。

豫西南地区的原有文化虽然被取代,但仍表现出较强的地方性特色,文化面貌呈现为屈家岭文化分布范围内的一个地域类型,

即“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二期类型”,在屈家岭文化早期阶段其分布范围已达该地,晚期遗存分布更为深入、更为广泛,包括唐白河流域和丹江流域,这一区域主要仍是屈家岭文化,其他文化因素尚不明显,不过此时亦有少量的豫西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遗物,如大口鼓腹罐、小口中领瓮、大口筒形罐、薄胎钵、釜形鼎等^[47]。

陕西东南部的丹江上游地区,文化面貌较豫西南地区复杂,以商县紫荆遗址为例,晚于仰韶文化的遗存^[48]中与长江流域史前文化有关的大致可分两段^[49]:一是与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二期类型时代相当的遗存,这类遗存包含了青龙泉二期类型典型因素和关中豫西地区流行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因素;二是与稍晚的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类型关系密切的遗存,但此时已经大量地受关中客省庄二期文化冲击(客省庄二期文化因素在前一阶段晚期已有体现)^[50]。

豫南地区在屈家岭文化早期已接受屈家岭文化的影响,但还不明显,到晚期影响才逐步深入,一直延续到石家河文化时期。该地与豫西南相邻,同时又通过大别山和桐柏山之间的狭小通道与湖北相通,屈家岭文化自然地影响至此。文化面貌体现了处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大文化传统交界地带的特点,既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又含有豫中、豫南仰韶文化晚期特征,如河南罗山李上湾第一组、信阳南山咀“仰韶文化”、党楼一期一类遗存、临汝北刘二期一类遗存等(此类遗存因地方性特色较浓,尚无统一认识,暂统称之为“豫南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其性质待进一步商榷),而靠近东部的部分遗址还受到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影响。

豫中地区即黄河中游地区的同期遗存更是面貌多样,文化因素显得更为复杂。黄河中游地处中原腹地,历来是先人们栖居生活的首选之地,新石器时代晚期该地区的主流文化是仰韶文化,而这一时期大规模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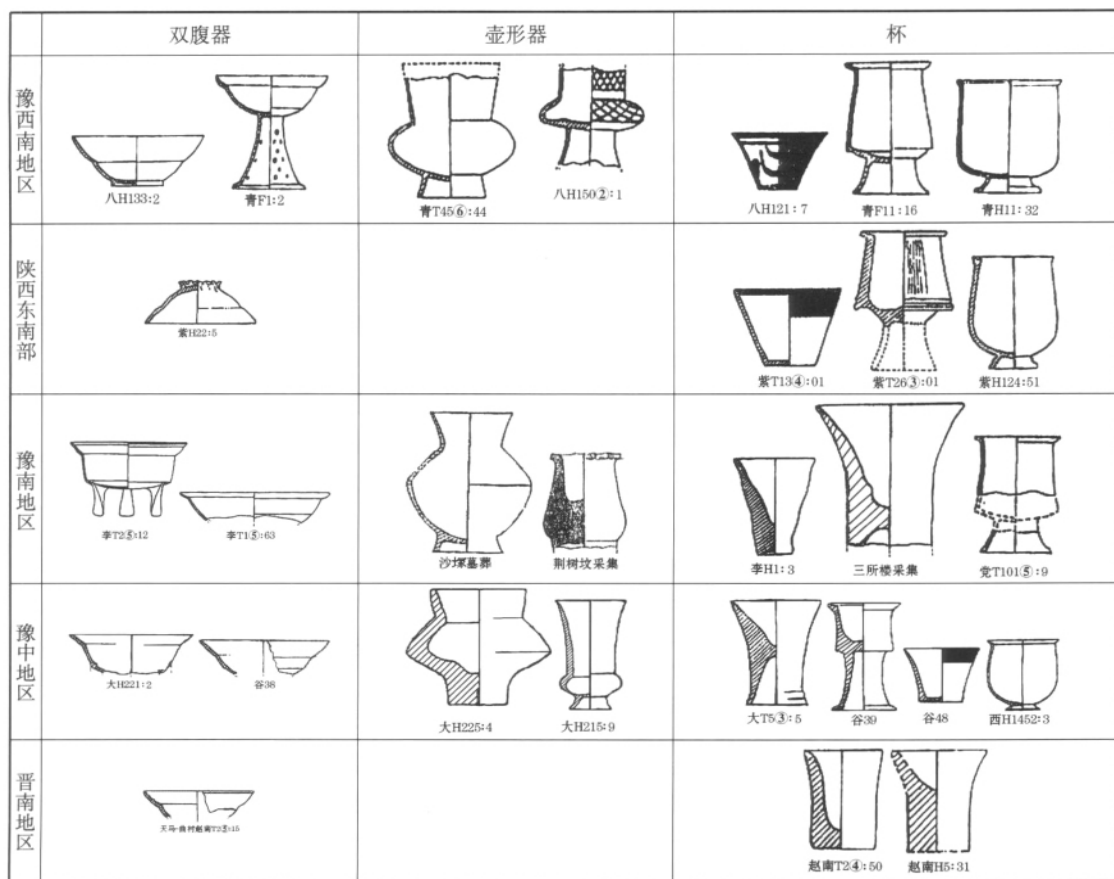
交流促使文化圈的范围扩展,界限也变得模糊起来;仰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圈交流的过程中位居主动且强有力^[51]。在这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中,地处中原腹地的豫中地区不可避免地成了“主战场”,是碰撞与融合的集中点,所谓的“大河村类型”就包含了多方面的文化因素,但从整体上讲,它仍然属于仰韶文化范畴之内。与屈家岭文化有关的遗存主要有大河村第三、四期文化、谷水河第二、三期文化、西山第四、五、六组遗存等,这类遗存中既包括屈家岭文化的典型器物 and 典型特征,还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特点,又溶入了大汶口文化的某些风格,到后期又有龙山时代早期因素的影响。此类遗存的复杂也恰恰说明了此期文化的交流,中原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吸收正是其生命力强

劲的反映。

当屈家岭文化延伸到晋南曲村一带时,影响范围和程度在晋南关中文化的压力下已相当薄弱,因而这一地区的文化内涵则主要呈现为庙底沟二期文化;无论是数量上,还是种类,以及器形变化上,屈家岭文化因素都仅仅是其不起眼的点缀而已。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同种典型器物的差别和变化来看分析其区域性问题,因屈家岭文化的双腹器、壶形器和喇叭形杯^[52]流行普遍,其形态变化和区别则直接反映了同种文化因素的地域性差异。(图八)

从图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几类器物因地域和时间的不同,形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屈家岭文化基础上又融入了当地原有文化的特征。



图八 屈家岭文化典型器物的地域差别

根据黄河流域屈家岭文化遗存分布的特点及遗存性质内涵的分析,加之历史地理条件的制约,屈家岭文化北渐的路线基本明晰:首先,由屈家岭文化中心分布区即江汉平原的京山屈家岭、天门石家河^[53]一带,越过大洪山、荆山向北通过“枣随走廊”到达随州^[54]、枣阳地区,沿汉水向上到达宜城^[55]、襄樊、房县^[56]一带的鄂北地区,向东则到达大别山脚下的麻城^[57]、罗田^[58]一线,这就打开了由江汉平原通向阳阳盆地的缺口,屈家岭文化便以不可阻挡之势轻而易举地挺进到豫西南地区,其势力占据该地以后,就敞开了向中原、关中传播的大门,唐白河流域和丹江流域的原始文化直接被取代,这在屈家岭文化早期阶段已经实现,另外对豫南和丹江上游地区也略有影响;而到了晚期,屈家岭文化势力便以豫西南地区为据点,逐渐对周围地区施加影响,沿丹江到达丹江上游商县、庾原一带;向北则翻过伏牛山,由“方城缺口”到达了中原地区的汝颖地区,进而向北到洛阳、郑州一线的伊洛地区和黄河中游两岸,接着屈家岭文化因素渗入到晋南地区的曲村附近,但已明显微弱;而豫南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则接受了大致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由大别山、桐柏山之间的缺口到达信阳、罗山、息县、淮滨等地,二是由豫西南传入确山、正阳一带,三是在晚期阶段接受了豫中地区的影响,由豫中反向影响至豫南。屈家岭文化的北渐主要是依靠陆路进行的,翻山越岭,穿过平原、盆地,沿河流向上传播,最终形成屈家岭文化的北部分布格局。

四、屈家岭文化北渐原因试探

屈家岭文化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兴起以后,经短短几百年的扩张,势力向北迅速伸展到黄河中游的中原仰韶文化分布区,并对邻近地区施加强大影响,一些地区被其基本同化和融合;而对北方中原地区的影响是屈

家岭文化向外传播的主要方向。

根据史书及古史研究,屈家岭文化时期活跃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民族为苗蛮集团,或称“三苗”。有学者认为,屈家岭文化是大汶口文化向西南迁移并与大溪文化融合而成,而苗蛮是由东夷集团分化而来^[59]。整体而言,此时主要有三支强大的力量活跃在长江、黄河流域,即河洛地区的华夏集团、江汉地区的苗蛮集团和海岱地区的东夷集团^[60]。文献中对夷夏与三苗之间战事的记载也不少,但多为传说时代的零散记录,或语焉不详,并不十分可靠^[61]。

屈家岭文化时期,其发展势头强劲,趁机挺进豫西南地区,影响深入到河洛地区。随后,黄河中游地区文化则受到三重文化因素的影响,并进一步的交流与融合,因而导致豫中河洛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多重因素——仰韶文化遗风、屈家岭文化因素和大汶口文化特点。从文化影响深度看,鄂北、豫西南地区文化面貌在此期几乎完全被屈家岭文化取代。屈家岭文化为代表的苗蛮势力占领豫西南一带以后,进入一个相对平稳发展时期,从而促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考古学文化上相应地反映为豫南、豫中等地的多元文化面貌。

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一带兴起的一系列屈家岭文化古城及其遗址群,包括屈家岭文化早期的湖南澧县城头山^[62](可早至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晚期的湖北石首走马岭^[63]、江陵阴湘城^[64]、公安狮子口鸡鸣城^[65]、荆门马家院^[66]、湖南澧县鸡叫城以及始筑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而繁荣于石家河文化早期的湖北天门石家河城址及其遗址群^[67],城址均有护城河,堆土夯筑,即环壕土城,其防御设施除护城河外,还有河外的若干高台,类似后世的烽火台^[68]。这些城址应为其政治中心,最为明显的当属石家河古城,城垣大体圆角方形,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城内外密布各类遗址群。邓家

湾^[69]出土的大量陶塑小动物和跪坐人抱鱼塑像明显带有专业化生产的痕迹,这些产品还远销中原等地;罗家柏岭^[70]发现的庭院式建筑遗迹以及精美的玉石制品和残铜片、孔雀石、铜渣等均昭示了石家河古城的重要地位。这些城址表现了这一时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较强的发展趋势,也反映出其对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的贡献^[71]。

由此,根据文献记载以及考古遗存的性质,江汉平原屈家岭文化的北渐,是伴有人口流动的军事活动、文化交流与融合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这两个相对独立文化圈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既反映在屈家岭文化势力对豫西南地区的占领上,又体现在与豫南、豫中诸地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上。伴随着屈家岭文化的北渐,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在更大范围内深入展开。但在随后新的文化因素下,在文化碰撞与融合的推动下,最终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统一趋势^[72]。

(附记:本文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樊力先生的悉心指导,“沉思前事,似梦里,泪暗滴”,谨以此纪念敬爱的樊老师!)

- [1]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京山屈家岭.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65.
b. 屈家岭考古发掘队. 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 考古学报, 1992, (1).
- [2] a. 李龙章. 浅议石家河文化. 江汉考古, 1985, (3).
b. 刘德银. 论石家河文化早期与屈家岭文化晚期的关系. 江汉考古, 1990, (3).
- [3] 张绪球. 屈家岭文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4.
- [4] a. 向绪成. 试论长江中游与黄河中游原始文化的关系. 考古与文物. 1988, (1).
b. 任式楠. 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 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 [5] 樊力. 豫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考古学报. 2000, (2).
- [6] a. 沈强华. 试论屈家岭文化的地域类型. 考古与文物. 1986, (2).
b. 祁国钧. 试论屈家岭文化的类型及相关问题. 江汉考古. 1986, (4).
c. 林邦存. 关于屈家岭文化区、系、类型问题的初步分析. 江汉考古. 1997, (1); (续) 江汉考古. 1997, (2).
- [7] 樊力. 论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二期类型. 考古. 1998, (11).
- [8] a. 樊力. 论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类型. 考古与文物. 1999, (4).
b. 张绪球. 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 考古学报. 1991, (4).
- [9] 张绪球.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 武汉: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 [10] 文化因素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既包括陶器组合与器物形制, 也包括聚落形态、生产与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 前者表现较为明显, 本文即以此为主进行分析。
- [11]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青龙泉与大寺.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0.
b. 长办文物考古队直属工作队.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 考古. 1961, (10).
- [12] a.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 浙川下王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9.
b. 河南省博物馆等. 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 文物. 1972, (10).
- [13]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河南分队. 河南浙川黄楸树遗址发掘报告. 华夏考古. 1990, (3).
- [14] 原长办考古队河南分队. 浙川下集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中原文物. 1989, (1).
- [15] a.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的调查与试掘. 华夏考古. 1994, (2).
b.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 河南邓州市八里岗遗址1992年的发掘与收获. 考古. 1997, (12).
c.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 文物. 1998, (9).
d.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 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1998年度发掘简报. 文物. 2000, (11).
- [1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南唐河寨茨岗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 1963, (12).
- [17]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南唐河茅草寺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 1965, (1).
- [1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南镇平赵湾新石器时

- 代遗址的发掘. 考古. 1962, (1).
- [19] 南阳地区文物队, 方城县文化馆. 河南方城县大张庄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 1983, (5).
- [20] a.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 1991 年唐白河流域及淮源史前遗址的考古调查. 江汉考古. 1996, (2).
b. 安金槐.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四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 华夏考古. 1992, (3).
c. 樊力. 论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二期类型. 考古. 1998, (11).
d. 樊力. 丹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试析. 江汉考古. 1997, (4).
- [21] a. 安金槐.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四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 华夏考古. 1992, (3).
b. 孙广清. 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中原文物. 2000, (2).
- [2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河南罗山县李上湾新石器时代遗址. 华夏考古. 2000, (3).
- [2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南泌阳板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 考古. 1965, (9).
- [24]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 河南驻马店市党楼遗址的发掘. 考古. 1996, (5).
- [25]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 河南淮滨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 考古. 1981, (1).
- [2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河南信阳三里店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59, (1).
- [27] a. 安金槐.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四十年发展历程的回顾. 华夏考古. 1992, (3).
b.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信阳发掘小组. 河南信阳市阳山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记. 文物参考资料. 1955, (8).
- [28]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 1991 年唐白河流域及淮源史前遗址的考古调查. 江汉考古. 1996, (2).
- [29] a.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 河南驻马店市杨庄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95, (10).
b.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 [30] a. 商县图书馆等. 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 1981, (3).
b. 王世和, 张宏彦. 1982 年商县紫荆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 文博. 1987, (3).
- [31] a. 梁星彭, 陈超. 商县紫荆第四期文化遗存试析. 考古与文物. 1984, (3).
b. 樊力. 丹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试析. 江汉考古. 1997, (4).
- [32] 董雍斌. 陕西商州市庾原遗址调查. 考古. 1995, (10).
- [33] 安康地区博物馆. 1987 ~ 1989 年陕西安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 考古. 1994, (6).
- [34] a. 河南省博物馆. 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79, (4).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 1975 年豫西考古调查. 考古. 1978, (1).
- [35] a. 郑州市博物馆. 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79, (3).
b.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等. 郑州大河村遗址 1983、1987 年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96, (1).
c.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等. 郑州大河村遗址 1983、1987 年仰韶文化遗存发掘报告. 考古. 1995, (6).
d. 郑州市博物馆. 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的房基遗址. 考古. 1973, (6).
e.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大河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1.
- [36] 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培训班. 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址的发掘. 文物. 1999, (7).
- [37]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等. 河南荥阳县楚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 考古. 1995, (6).
- [38]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 伊河下游几处新石器遗址的调查. 考古. 1964, (1).
- [39]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等. 河南省巩义市里沟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95, (6).
- [40]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登封县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 考古. 1995, (6).
-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 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 1982, (4).
- [42]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新安县西沃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99, (8).
- [43] a.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 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61, (4).
b.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洛阳王湾考古发掘报告.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河南一队. 河南汝州中山寨遗址. 考古学报. 1991, (1).
- [45]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孟县许村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 1999, (2).
- [46]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西实习组等. 翼城曲沃考古勘查记. 北京大学考古系编. 考古学研究 (一).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
- [47] a. 樊力. 豫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 考古学报. 2000, (2).
b. 樊力. 论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二期类型. 考古. 1998, (11).

- [48] 即是以第一次发掘简报中的第三期的一部分、第四期和第二次发掘简报中的第三、四、五期为代表的遗存,这里主要是指通常所说的商县紫荆第四期文化遗存。
- [49] 樊力. 丹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试析. 江汉考古. 1997, (4).
- [50] 梁星彭, 陈超. 商县紫荆第四期文化遗存试析. 考古与文物. 1984, (3).
- [51] 赵辉. 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 文物. 2000, (1).
- [52] 韩建业. 斜腹杯与三苗文化. 江汉考古. 2002, (1).
- [53] a. 石河联合考古队. 石河遗址群 1987 年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 江汉考古. 1989, (2).
b. 石河考古队. 湖北省石河遗址群 1987 年发掘简报. 文物. 1990, (8).
c. 北京大学考古系等. 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 南方民族考古 (第五辑).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d.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等. 肖家屋脊.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 [54] 襄阳地区博物馆. 随州几处古遗址调查. 江汉考古. 1985, (2).
- [55]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 湖北宜城曹家楼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学报. 1988, (1).
- [56] a. 湖北省博物馆等. 房县七里河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 江汉考古. 1984, (3).
b. 湖北省博物馆等. 房县羊鼻岭遗址调查简报. 江汉考古. 1982, (1).
- [57]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 湖北麻城栗山岗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学报. 1990, (4).
- [58]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湖北罗田庙山岗遗址发掘报告. 考古. 1994, (9).
- [59] a. 韩建业, 杨新改. 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 中原文物. 1996, (4).
b. 龚维英. 论东夷族团的分化及皋陶族的南徙. 江汉考古. 1989, (1).
- [60] 徐旭生.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 [61] a. 樊力. 略论三苗族及其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原文物. 1998, (1).
b. 杨新改, 韩建业. 禹征三苗探索. 中原文物. 1995, (2).
- [62]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 文物. 1993, (12).
- [63] 荆州市博物馆等. 湖北省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 1998, (4).
- [64] a. 江陵县文物局. 江陵阴湘城的调查与探索. 江汉考古. 1986, (1).
b. 荆州博物馆等. 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 考古. 1997, (5).
c. 荆州博物馆. 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 1995 年发掘简报. 考古. 1998, (1).
- [65] 贾汉清. 湖北公安鸡鸣城的调查. 文物. 1998, (6).
- [66] 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 荆州马家院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 文物. 1997, (7).
- [67] 同 [53].
- [68] 何介钧. 长江中游史前古城. 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 (考古学卷).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69] a. 石河考古队. 湖北天门市邓家湾遗址 1992 年发掘简报. 文物. 1994, (4).
b.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邓家湾.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3.
- [70]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 考古学报. 1994, (2).
- [71] 赵辉, 魏俊. 中国新石器时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古代文明 (第 1 卷).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 [72] 同 [51].

(责任编辑: 方燕明)